

70
YEARS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1949–2019

新中国 70 年
优秀文学作品文库

中国当代重要小说
分年评介

A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JOR
NOVELS IN DIFFERENT YEARS

马振宏 / 编著

第三卷
No. 3

70



中国言实出版社

70
YEARS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1949—2019

新 中国 70 年
优 秀 文 学 作 品 文 库

中 国 当 代 重 要 小 说
分 年 评 介

A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JOR
NOVELS IN DIFFERENT YEARS

马 振 宏 / 编 著



3

第 三 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作者简介

马振宏

副教授。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学术研究文章三十余篇，参编《大学语文》一部（任副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发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中篇小说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短篇小说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中国当代重要小说分年评介》

马振宏 编著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散文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诗歌卷》

李少君 主编

卷一
中篇小说
卷二
短篇小说
卷三
中国当代重要小说分年评介
卷四
散文
卷五
诗歌

第三卷概述

summary

本卷评介的是2000年以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每年度小说排行榜^①的长、中、短篇小说及少数虽然没有获奖、没有进入排行榜，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小说。

一、“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小说排行榜上榜长中短篇小说

2000—2013年（2014年之后的长篇小说有待于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共有19部长篇小说获得第6届至第9届茅盾文学奖。具体而言，在2003年举办的第6届（1999—2002）茅盾文学奖中，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英雄时代》、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已在中卷评介）中的第二卷《东藏记》获奖；在2007年举办的第7届（2003—2006）茅盾文学奖中，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获奖；在2011年举办的第8届（2007—2010）茅盾文学奖中，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奖；在2015年举办的第9届（2011—2014）茅盾文学奖中，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获奖。

① 下文所说的“小说排行榜”，均指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



在 2001 年至 2018 年举办的第 2 届至第 7 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活动中，共有 58 篇中短篇小说获奖。第 2 届的评奖范围是 1997—2000 年期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共评出 10 篇获奖小说，其中 9 篇因发表在 1997—1999 年期间，所以在中卷已经评介过；剩下的 1 篇是衣向东的中篇小说《吹满风的山谷》，因其发表在 2000 年 1 月，所以在本卷进行评介，也即本卷评介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是 49 篇。

在 2004 年举办的第 3 届（2001—2003）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获奖的短篇小说是温亚军《驮水的日子》、王祥夫的《上边》（同时进入 2002 年度小说排行榜）、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王安忆的《发廊情话》，获奖的中篇小说是毕飞宇的《玉米》（同时进入 2001 年度小说排行榜）、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同时进入 2002 年度小说排行榜）、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同时进入 2002 年度小说排行榜）。

在 2007 年举办的第 4 届（2004—2006）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获奖的短篇小说是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同时进入 2004 年度小说排行榜）、李浩的《将军的部队》、邵丽的《明惠的圣诞》、范小青的《城乡简史》、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同时进入 2006 年度小说排行榜），获奖的中篇小说是晓航的《师兄的透镜》、葛水平的《喊山》、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蒋韵的《心爱的树》、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

在 2010 年举办的第 5 届（2007—2009）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获奖的短篇小说是盛琼的《老弟的盛宴》、苏童的《茨菰》（同时进入 2007 年度小说排行榜）、次仁罗布的《放生羊》、陆颖墨的《海军往事》，获奖的中篇小说是吴克敬的《手铐上的蓝花花》、李骏虎的《前面就是麦季》、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同时进入 2008 年度小说排行榜）、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鲁敏的《伴宴》、方方的《琴断口》（同时进入 2009 年度小说排行榜）。

在 2014 年举办的第 6 届（2010—2013）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获奖的短篇小说是叶弥的《香炉山》、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张楚的《良宵》、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叶舟的《我的帐篷里有平安》，获奖的中篇小说是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同时进入 2010 年度小说排行榜）、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同时进入 2011 年度小说排行榜）、王跃文的《漫水》、格非的《隐身衣》。

在 2018 年举办的第 7 届（2014—2017）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获奖的短篇小说是

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同时进入2014年度小说排行榜)、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弋舟的《出警》、朱辉的《七层宝塔》(同时进入2017年度小说排行榜)，获奖的中篇小说是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同时进入2014年度小说排行榜)、阿来的《蘑菇圈》、尹学芸的《李海叔叔》(同时进入2016年度小说排行榜)、小白的《封锁》、肖江虹的《傩面》。

从2000年开始，中国小说学会每年对全国公开出版、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进行排行，19年来(2000—2018)，已经有400多篇(部)小说进入排行榜。

另外，本书也评介了没有获得上述奖项，也没有进入排行榜的许多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中享有很大的知名度，比如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张炜的长篇小说《外省书》、杜光辉的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腔废话》和《手机》、山飒的长篇小说《围棋少女》、赵本夫的小说《即将消失的村庄》、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拯救乳房》、林白的短篇小说《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六六的长篇小说《王贵与安娜》和《双面胶》、木子美的日记体小说《遗情书》、严歌苓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和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当年明月的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赵赶驴的长篇小说《赵赶驴电梯奇遇记》等。

二、2000年以来小说的类型

对上述几类小说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反映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归纳起来有如下类型。

第一类，历史反思小说。

首先是书写古代历史的小说。像熊召政的《张居正》、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等是在传统历史主义指导下对历史真相进行还原的小说。《张居正》的作者依靠学问和识力，用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的复杂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大秦帝国》在真实性、文化思想性、审美艺术性上都称得上是水准较高的作品。

其次是讲述现代战争或在现代战争背景下发生的故事的小说，包括清末民初军阀



混战背景下的故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比如莫言的《檀香刑》把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等历史事件作为叙事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活灵活现地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何顿的《湖南骡子》对残酷的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结构宏大，是一部少见的具有史诗性特点的优秀历史长篇小说。成一近百万言的《白银谷》将翔实的史实依据与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飘摇激荡的社会与让人牵挂的人物命运艺术地融为一体，丰满鲜活地展现了康秦两家在生意场上殊死的争斗，也展现了康家父子对同一个女人的感情。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是一部富有浪漫气质的英雄传奇，小说的核心人物马仲英使“西北王”冯玉祥都难以抵挡。小说具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浪漫的情怀，更有生命的真谛和灵魂不死的传说以及浓郁的浩然之气。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成功刻画了梁大牙、窦玉泉、张普景、李文彬、东方闻音、朱预道、杨庭辉等人的鲜明形象，展示了一帧雄阔壮烈的民族战争画卷。艾伟的《中篇1或短篇2》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故事。另外，陈河在2009年底发表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讲述了国内几乎无人去写的华人在马来亚热带丛林里的对日作战情况。2018年，陈河出版的长篇小说《外苏河之战》又关注了一群中国青年在20世纪60年代积极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并捐躯于异国的悲伤故事，表现了战争中人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个题材也是国内几乎没人去写的战争题材。

上述这些小说像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张炜的《古船》、余华的《活着》等新历史主义小说一样，用新历史主义方法来进行创作。新历史主义小说虽然承认客观历史的存在，但它更多地把历史的书写理解为一种主观性明显的叙事行为，而不是对历史的客观再现；它强调民间视角、个人体验；强调对边缘人物、非史资料的书写。除上述例子外，还有赵琪的《援军》、红柯的《库兰》、阿成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周大新的《旧世纪的疯癫》、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麦家的《解密》、杨剑敏的《突厥》等，它们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或古代多个时期的事情。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苏童的《刺青时代》、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叶广芩的《豆汁记》和《三岔口》、杨少衡的《昨日的枪声》、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

蚁病了》、蒋韵的《朗霞的西街》、麦家的《日本佬》、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方方的《软埋》、刘庆的《唇典》、范迁的《锦瑟》、张翎的《劳燕》、徐贵祥的《鲜花岭上鲜花开》等从战争年代写到现在，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几个时期的历史。贾平凹在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既是一部篇幅宏伟的历史小说，也是一部关于秦岭的“百科全书”。小说讲述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盘根错节的历史，是一部浩瀚、厚重、饱满的史诗性力作。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周大新的《旧世纪的疯癫》、徐怀中的《牵风记》等小说也书写了战争年代的奇人奇事。

再次是反映“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及其以后生活的小说，数量也很多。比如蒋韵的《一点红》、杨显惠的《逃亡》、毕飞宇的《玉米》、孙春平的《地下爱情》、张洁的《无字》、文兰的《命运峡谷》、艾米的《山楂树之恋》、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杨志军的《藏獒》、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毕飞宇的《平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莫言的《生死疲劳》、金宇澄的《繁花》、韩少功的《日夜书》等。王祥夫在201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一粒微尘》让我们看到了十年动乱对美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性的伤害，对个人生活的破坏及主人公心灵上的挣扎。

第二类，反映新时期以来丰富多彩的现实情况，涉及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生活及人们的感情等多个向度。

首先是底层写作。“底层写作”是新世纪开始后文坛上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很多作家在小说里关注了中国底层大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苦难和坚韧、奋斗不成的悲怆。这些小说从创作主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专业作家创作的反映城市底层市民或农民工问题的打工文学作品，聚焦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焦点矛盾，即城乡差别和“三农”问题。比如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写离异、下岗的女工艾云为自己置办好昂贵华美的寿服，希望能挽回丈夫和儿子。但在一个雨夜，她却死于车祸，身上的寿服沾满了血污和泥泞。小说对艾云精神世界的描画堪称绝妙，展示了艾云的死不仅在于生活的困顿，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困顿。黄咏梅的《负一层》中的阿甘是一个看守地下室的39岁的老姑娘，她最后从三十层楼上跳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铁凝的《逃跑》写老宋被亲戚介绍到城里的一个剧团做传达室的临时工，患腿病之后，他拿着人们给他的捐款逃回乡下，只用一小部分钱治病，剩下的钱补贴给贫穷无助的女儿、外孙开了个小卖店。小说力图揭示人性与



现实、道德与生存的紧张关系。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讲述了一个远在他乡谋生的手艺人大老郑和与他情投意合但又没有名分的女人的情感生活。小说表达了人的原始生命本色和生存的渴望，触及了人的生命之“疼”。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叙写了一对乡下孪生姐妹冷红、冷紫的坎坷人生。冷红退学进城做妓女，冷紫得知姐姐为了让自己能上大学才做出这样的牺牲时，也做了妓女。小说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都市底层女性的生存苦难与精神救赎。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叙述了菜农马全进城游逛，突然醒悟到：人生本来就是应该享福的。于是，他吃喝玩乐，尽情消费。当他心满意足地回到家时，却发现自己的葬礼正在举行。小说以马全的“灵魂”进城为隐喻，发掘了现今乡村人对城市“幸福”的渴慕。夜子在201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旧铁轨》描写了底层人的生存状态。

另一类是由打工作家创作的“打工文学”，它们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也是最具鲜明时代转型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它们涉及了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等一系列问题。第一代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是被人们称作“五个火枪手”的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他们的作品大多用笔墨和泪水鞭挞了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了打工生活的苦难，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抒发了对打工城市的抗拒，对自身身份的自卑，对谋生不易的痛楚和失败的无奈以及对久经艰辛偶遇成功的惊乍和感恩等。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因为多数获得过共青团中央2005年1月颁发的首届“鲲鹏文学奖”而被称为“鲲鹏”派。他们的作品涉及打工生活的任意片段，文字展露出沉稳性和多样性，代表作家有王十月、何真宗、赵美萍、朱学仕、李樱子等。其中的王十月等经过不断修炼，已经能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创作出更成熟、更深刻，不再仅仅属于打工文学范畴的小说了，比如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已经超出了打工文学的惯常视角。另外，打工文学最初写的是蓝领生活，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蓝领中的不少人已经转化成白领，于是打工文学也有了延伸，有了新的分类，它们写白领生活的，现在叫作职场文学，代表作如李可的小说《杜拉拉升职记》。^①

其次是乡土小说。21世纪到来后，书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数量非常大，也涌现

^① 参阅雷达《“打工文学”：今生与今后》，《人民日报》，2011.6.14；张一文《概论“打工文学”》，八斗文学网站，2007.5.9。

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可以从题材、文学思潮等多个角度对这些小说进行类型上的划分。比如从题材角度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一是写农民进城。前述的由专业作家和打工作家创作的“打工文学”就属于这种情况。

二是写乡村日常生活。这类小说最多，主要写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急剧转型、变化及发生在乡村里的多种多样的事情。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写德山老汉接受了刘副专员赠送的一对外国羊，他在倾其所有喂养这对羊时，却使女儿失去了生命。小说用荒诞的手法写了一出由权力异化导演出的扶贫闹剧及其酿成的家破人亡的悲剧，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阎连科的《白猪毛黑猪毛》写人们争着抢着去替开车撞死人的镇长坐牢的事情，批判了权力对农民的欺压。孙惠芬的《歇马山庄》写乡村爱情，反映了人物之间互相伤害的情况，月月伤害了林国军，程买子伤害了月月，庆珠伤害了程买子，年轻男老师伤害了林小青。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写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意外死亡，质问了我们到底有没有知道或者怀疑真相的权力的问题。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以惊心动魄的故事，凸显了社会冲突的巨大死结。林森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给渔民们传统的出海渔猎方式遭受资本吞噬的命运吟唱了一曲悲伤的挽歌。秦岭的短篇小说《天上的后窗口》揭示了西部乡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根脉的断裂、精神世界的迷失等问题。除此还有陈应松的《太平狗》和《松鸦为什么鸣叫》、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原非的《卖牛》、陈忠实的《日子》、陈应松的《望粮山》、巴桥的《阿瑶》、李洱的《龙凤呈祥》、胡学文《麦子的盖头》等。

三是写乡土生态。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采用的是不露声色的“呈现”，通过呈现日常的细节，展示乡村生态环境的衰颓与凋敝，也表现了乡村人心的躁动与不安。他的《怀念狼》的寓意颇丰，被誉为中国商州版的“猎人笔记”。该小说讲述了猎人、记者、烂头为商州尚存的十五只狼拍照存档的离奇经历。鲍十的中篇小说《岛叙事》描写了一个小岛开发的计划与岛上天然风光、岛上居民传统生活发生的冲突。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批判了一些污浊、阴暗的人毁灭大自然生灵的事情，触及了东北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与体制迷思等问题。

四是写乡土历史。主要是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即对“抗战记忆”和“革命记忆”“文革记忆”的书写，这些记忆是与村庄变迁、家族秘史关联在一起的，是传统家



族观念在新世纪回潮的叙事表现。书写“文革记忆”的如阎连科《坚硬如水》、毕飞宇的《玉米》等；书写“抗战记忆”的如白天光《洪家炮楼的二胡》、陈世旭的《波湖谣》；书写要求公平、正义的“革命记忆”的如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铁凝的《笨花》等。

李兴阳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十年》一文中认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题材疆域的扩大与小说边界的拓展。之二是对“三农”（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现实关切及对其文化意义的深入开掘。这些小说中的“农村”与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农村”相较，有很明显的“去乡村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农村的虚空化，具体呈现为“空心村”“空巢家庭”与虚空的“乡村主体”，如赵本夫的《即将消失的村庄》所写的故事。其二，农村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即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阶层分化与社会关系的重组，如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就写了这种情况。其三，伦理道德的蜕变与乡村世俗日常生活的图景，如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葛水平的《喊山》属于此类。其四，乡村民俗文化的兴衰与民间文化的重构，如贾平凹的《秦腔》、郭文斌的《吉祥如意》、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另外，与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相关叙写相较，这些乡土小说在写“农村经济生活”时出现了五个方面的变化：其一，表现了北方与南方不一样，东部与西部更不一样，如雪漠的《大漠祭》、李佩甫的《羊的门》就表现了地域差异的经济差别。其二，书写了传统农、牧、渔业的衰落与现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如李铁的《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其三，反映了乡镇服务行业的情色化问题、道德滑坡与现代意识滋长时的博弈问题，如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就是如此。其四，表现了乡村经济与政治的纠结：即乡村治理出现的危机和对乡镇权力的批判，如梁晓声的《民选》等。其五，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与乡土生态的问题，如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等就属于此类。^①

雷鸣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中认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有三大病症亟须摆脱。

一是苦难依赖症。新世纪小说渲染乡村苦难有三种模式：1. 物质匮乏型。如夏

^① 参阅李兴阳《新世纪乡土小说十年》，《湖北日报》2010.4.2。

天敏的《徘徊望云湖》把云南乌蒙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农民赤贫的生活勾勒得触目惊心。雪漠的《大漠祭》也以令人震撼的笔触描写了甘肃农民悲苦的生活境地。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刻画了生活于物质极度匮乏的神农架山区的农民九财叔的“苦日子”。陈应松的《太平狗》，葛水平的《喊山》都是如此。

2. 孤寂留守型。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后，农村日益“虚空化”，留守乡村的大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与儿童。如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梁晓声的《荒弃的家园》、郝伟的《相片》等都展示了这种乡村留守型苦难情况。

3. 权力压迫型。一些小说展示了异化的乡村权力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比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乱搞摊派，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等。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在副乡长毛文明权力的笼罩之下，尹小梅的死因永远被遮蔽、掩埋，村民吴响个人的力量在堂而皇之的权力面前是那样渺小、卑微。陈应松的《神鹫过境》，杜光辉的《浪滩的男人和女人》都以愤激的笔触描写了乡村政治权力对农民的经济剥削，给农民的艰辛生存带来了沉重压力。但东西的《耳光响亮》、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却在描写苦难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启示。

二是权力崇拜症。21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也有热衷于展示乡村权力角逐倾轧的作品，它们丝毫不亚于官场小说与历史题材小说。具体有三种叙事程式：

1. 阴谋夺权的精细化。如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讲述了太行山区小河西村的一场选举。候选人是原村主任李保库和村里的富翁黄国富。小说描写了两人使出浑身解数拉选票的情况。梁晓声的《民选》、尚志的《海选村长》、曹征路的《豆选事件》、荆永鸣的《老家》等作品亦都展示了乡村政治权力的争斗。

2. 权力性欲的惯例化。这类乡土小说中的权力拥有者常借助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性欲要求。如毕飞宇的《玉米》中的村长王连方正是这种乡村生活状态的集中映射。燕华君的《麦子长在田里》、向本贵的《泥泞的村路》、秦人的《谁是谁的爷》也写了这方面的事情。

3. 权力威严的夸大化。大多数作家在书写政治权力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时，也书写了农民的畏权心理与干部的绝对权威。如阎连科的《白猪毛黑猪毛》。艾伟的《田园童话》极度渲染了乡村权力令人惊恐的一面，村长的老婆生养了四个女儿后被强行结扎，村长于是对村里出生的所有男孩都滋生出仇恨的心理，这使全村人都很恐慌。“我们”的爹和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两个孩子最终都惨死在村长的手中。



三是城市恐惧症。21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还关注着进城后的农民生存的艰难与弱势状况，这是乡土小说视域的新拓展。这些作品总是对城市呈露出集体性的反感与恐惧，城市成了“万恶之所”，成了“危险”“丑恶”“堕落”的代名词。有三种模式。1. 逼良为娼型。在这类小说中，城市是纯洁乡村女子沦落的罪恶元凶、陷阱，很多进城的乡村女子在遭遇生存艰难或性侵犯时不得不沦为妓女。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就叙述了一对漂亮的农村孪生姐妹在城市里先后沦落为妓女的事情。张弛的《城里的月亮》、李肇正的《姐妹》、王梓夫的《花落水流红》、阎连科的《柳乡长》、林白的《去往银角》、巴桥的《阿瑶》、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和乔叶的《解决》等等，都是这种模式。2. 好人变坏型。许多小说把城市描写成一个欲望的大染缸，外来者进城后无可遏制地在这个染缸中沉沦，走向了恶的深渊。如尤凤伟的《泥鳅》中的农村青年国瑞在城里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变成了一个以恶抗恶的黑社会老大。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写乡村老人李四的儿女李香、李瓦和李城进城之后，天天想着的忙着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很少回乡看望老人，变得冷漠无情。李佩甫的《城的灯》写农村青年冯家昌在城市里学会了处心积虑地琢磨各种权术交易后，抛弃了为他奉献了一生的女性刘汉香。3. 绝望自杀型。一些小说将城市描写成吞噬乡村人生命的黑洞，使人物在无可奈何的绝望中走向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如邵丽的《明惠的圣诞》中，乡下姑娘明惠如愿嫁给了城里人，但她始终无法融入城市人的圈子，最终选择了自杀。陈然的《看不见的村庄》中那一对到省城靠打工想买房子，想做城里人的恋人伟珍和再萍，最后也死在了工地上。^①

最后是都市情感小说。新世纪都市情感小说围绕着爱情与面包，城乡差别、地域差异、裸婚、再婚、闪婚，丁克、蜗居、剩女、婚外情等话题和内容，为读者特别是以“70后”“80后”为主的读者观照现实生活、反省自身内在的精神需求提供了一部部活脱脱的生活样本。都市情感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以徐星、刘索拉、王朔、池莉、方方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塑造了一群生长在都市里的青年，代表了崭新的都市观。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都市小说开始到处上演爱情与身体、物质与欲望、金钱与权力、善良与邪恶、色彩与声音、理想与现实、痛苦

^① 参阅雷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文艺评论》2010.6。

与欢乐等种种故事。张楚的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讲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恋爱史，同时也对时间本身应该有的本来样貌进行了展现。潘军的短篇小说《泊心堂之约》揭示或展现了打麻将的四个人在生活和心灵深处隐藏的一些事情。王占黑的中篇小说《小花旦的故事》关注了大都市里弄中的庸常人生。另外，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厨房》等、邱华栋的《夜晚的诺言》《白昼躁动》、盛可以的《水乳》《道德颂》《取暖运动》、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第三类，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即边地小说。

边地小说是在西部兴盛起来的小说，在文坛上制造出了一波波的轰动效应。红柯的《乌尔禾》充满了诗性的想象力，背景宏阔，行文汪洋恣肆，举凡草原、大漠、羊群、石人像等，皆灌注了饱满的激情。作者将现实与想象、传说与生活融在一起，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灵异的大西北。姜戎的《狼图腾》描写了深沉、豪放、忧郁而绵长的蒙古长调及草原苍狼幽怨、孤独、固执于亲情的仰天哭嗥，表达了悲壮勇士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乐章。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一部描述中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小说语言精妙，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阿来的《空山》被称为是“一部中国的村庄秘史”，书中透露出阿来对藏族村庄文化、宗教文化的独特体验。同时，作者将那些被人漠视的、麻木的伤痛揭示出来后，形成了小说的宏大格局、庄严主题、厚重内容和繁复结构。小说的现实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当下乡村的某种破碎的东西。董立勃的《白豆》把作者的母亲、姨娘以及众多去新疆开荒的兵团女兵的影子凝聚在白豆身上，奏唱出的是一首悲怆忧愤的长歌。正是这充满了血和泪的歌声，将弱小者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重新显现了出来，在读者的心坎上久久回旋，令人慨叹。另外，董立勃的《米香》《青草》，杨志军的《藏獒》及其续集，范稳的《水乳大地》等等都给人呈现了一种边缘、边远地带充满异域色彩的生活。

第四类，知识分子小说。

21世纪以来，一些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比如张洁的《无字》在写吴为和胡秉宸恋爱、结婚、离婚之事时，还写了吴为母亲叶莲子、生父顾秋水的故事。小说的叙事未按时间顺序写，未受空间分割，但却对男性权力意识和政治



权力意识，对传统文化思维及社会习惯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后现代式的颠覆和解构，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类爱情中永恒创伤的剧烈疼痛，展现了它在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那一面。宗璞的《东藏记》虽为战争背景，描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国知识者在国破家亡中的铁骨丹心及他们对正义、自由、民主、节操的追求。尤凤伟的《中国：1957》采用私人记忆的方式，以知识分子的精神流浪史为线索，刻画了周文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苏英、吴启都、陈涛、张克楠、董不善、高干等将近50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他们的命运。小说厚重丰富，阐释了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生命历程，拷问了人的生命尊严与道德良知，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格，也暴露了其人性的软弱面。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从一个孩童的经历和视角出发，写了中原三个大家族即“我”的大舅、父亲以及姨父三个家族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揭示了三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秘史”及他们忧国忧民、追求光明、报效国家的艰巨历程。麦家《解密》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从事密码破解工作的知识分子，他天赋极高，孤僻冷漠，他的传奇人生、家族秘史、天才智慧都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张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被认为是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异数：粗俗、高雅，抽象、感性，普通话、方言，知识分子、农民，数学、肉体、诗等等，众声混杂，叙述了“文革”和“知青”记忆。阎真的《沧浪之水》触及的是一个关于“学而优则仕”的古老话题，但却深刻触及了当代知识分子在面临新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抉择时的挣扎、困惑和最终的选择等问题。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是一部呈现、探索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百科全书，一部书写当代文明困境的隐喻之书。慢先生的短篇小说《魔王——献给我的父亲》讲述了一个指挥家正在指挥演出时，他的吸毒的儿子殒命于舞台的悲惨故事。小说展现了那个指挥家在教育儿子成才、走正道问题上的极度无奈，儿子最终和他的高级知识分子爷爷一样都因心里驻扎了魔王而从高处坠落，离开了这个让他们的欲望难以实现的世界。

第五类，女性小说。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当代的女权/女性主义理论进入我国后，女性主体意识日渐增强，女性话语的中心议题逐渐从反抗男/父权制为代表的男性话语，转向突显女性自我独立意识。另外，在我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都市化进程中，经济模式和劳动分工发生了巨变，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她们在社会工作与社会地

位上都与男性平等起来，女性的文化消费需求明显高涨。这刺激和驱动了更多的女性作者进入文学创作领域。

从2000年起，女性创作显得别样的喧嚣与异彩纷呈。除了主流的女性写作如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毕淑敏、迟子建、徐小斌、殷慧芬等不断地推出佳作外，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继续书写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个人情感体验以及在父权制社会中遭受的创伤性体验。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更是大胆地展现了女性私密的情感与心理状况，展现了女性的身体、性爱、欲望等问题。当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后，网络又成为了现代都市女性表达情感的新渠道，以安妮宝贝为代表的一批女性网络写手用中短篇言情小说及游记随笔等展现了“人性的虚无、绝望”。

也是从2000年起，女作家们对底层人的生存投注了独有的温情关怀，盛可以、葛水平、方方、严歌苓、须一瓜、迟子建、孙惠芬等一大批作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对城市和农村底层里不同形态的女性生存状态进行着切实的关注、深刻的描摹和知性的思索。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村女子潘巧巧沦为杀人犯的悲惨故事，潘巧巧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小说让人扼腕叹息、感慨万千。潘巧巧在沦为杀人犯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与她的命运相关的人物，他们或温情脉脉极富爱心，或十恶不赦愚昧至极。他们共同造就或目睹了潘巧巧的悲惨命运。同时，他们也在完成着自己的悲剧人生。小说突出反映了同样因为怀抱城市幻想而走出乡村家园，却陷入谎言、残酷、悲情现实圈套中的一群底层无知女性的令人慨叹的遭遇。方方的《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是个漂亮姑娘，歌唱得也好。她为了和公婆分开居住，想给自己盖一座带厕所、浴室的房子，于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不择手段地拼命挣钱。当她把钱交给贵清去买材料后，贵清却把钱拿去赌博，转眼之间把钱输光了。英芝于是把汽油浇在贵清身上点燃了。最终，英芝被枪毙。但那奔跑的火光一直却在英芝的脑中追赶着她。小说以女性独特、细腻、敏锐的视角表现了对转型期农村新女性的关照。作者对女性的生存处境做了剖析和反思，探讨了女性悲剧的生成原因及其根源，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何玉茹的《素素》将整个故事情节结构分为“约会”“进城”“恋爱”“痛苦”“成家”“婚后”“理想”等七个片段，讲述了女主人公素素的情感状态与心灵轨迹，成功地再现了当下现实中极平凡又引人深思的平民爱情。裘山山的短篇小说《听一个未亡人讲述》描写了一位妻子对死在澳